



东北亚研究丛书

江户时代日本 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

THE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EDO PERIOD

陈景彦 王玉强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东北亚研究丛书

江户时代日本 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

THE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CONFUCIANISM
IN JAPAN

陈景彦 王玉强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陈景彦,王玉强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2

(东北亚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6343-8

I. ①江… II. ①陈… ②王… III. ①儒学—研究—日本—江户
时代 IV. ①B3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8637 号

· 东北亚研究丛书 ·

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

著 者 / 陈景彦 王玉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高 雁

责任编辑 / 许秀江 刘宇轩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中心 (010) 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343-8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周作人在 1935 年曾说过这样的话：“中日同是黄色的蒙古人种，日本文化古来又取资中土，然而其结果乃或同或异，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又何以嗜好迥殊耶。我这样说似更有阴沉的宿命观，但我固深钦日本之善于别择，一面却亦仍梦想中国能于将来荡涤此诸染污，盖此不比衣食住是基本的生活，或者其改变尚不至于绝难欤。”^①以时间计，距今已近 80 年，但周作人先生所思考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去研究。

江户时代是日本步入近代化的关键时期，整个江户时代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社会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江户时代也迎来了思想文化的空前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固然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紧密相连，但其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滋养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笔者以为，日本在江户时代之前，吸收儒家文化只是表层而已，更深层次的吸收则是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安井小太郎也曾说过：“到江户时代为止的日本学问始终是模仿中国的”。^②其指出了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吸取中国文化的特点。无论从中日两国的文献记载来看，还是从自古代起，日本便开始吸取中国儒家文化的历史过程来看，江户时代较之以前日本在吸取中国儒家文化方面，都有质的飞跃。这种质的飞跃，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不再只是识文阅籍。中国儒学初传日本，通说是应神天皇 16 年，即公元 285 年。是时百济人王仁赴日带去《论语》10 卷，《千字文》1 卷。日本最早以汉文写成的《古事记》（712）和江户后期开始编纂、直

① 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 145 页。

② 安井小太郎：《徨村遗文》跋，转引自连清吉《从螺旋史观看中日文化的发展》，台湾学生书局，2002，第 3 页。

到1906年才全部完成的《大日本史》均作如此记载。而日本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日本书纪》(720)在应神天皇16年条下也确有如是记述:“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故所谓王仁者,是书首等之始祖也。”^①中国学者张声振认为:王仁在日本教授倭王太子学习中国的经典,不仅有《论语》,而且包括《诗》《书》《易》《礼》《春秋》^②等经书。尽管如此,此时日本学习儒家经典只不过是汉文的加强习诵和记忆而已。进入江户时代则不同,经过一千余年的汉文知识的积淀,对很多日本人来说,识文阅籍只是理解应用儒学的工具和手段罢了。

其二,不再只是皇室贵族的特权。中国隋唐时期是日本较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随着遣隋使、遣唐使来中国以及隋唐使臣与各种工匠艺人等的赴日,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建筑、艺术、书法甚至风俗等大量传入日本。但仅就儒学而言,其所能学习和接受者,仍局限于皇室贵族上层文人及僧侣等人。儒家文化的传播也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场所。一是属于国家级的“大学寮”,二是地方的“国学”。前者是仿唐朝国子监而设,全日本只有一家;后者则是每一“国”中设置一所,数量极其有限,且能入学得以学习者,只有皇室贵族及其子弟们。这两种学校所采用的教科书基本一致,均为儒家经典。除此之外,便是日本的庙宇寺院。居住于此的僧侣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一些汉唐训诂类的纯书本研究。到了江户时代,日本吸取儒家文化的现象遍及整个社会。就官方而言,德川政权设立大学头,以朱子学为宗的林罗山一家一直把持着这一位置,并按其自己的解释传播朱子学。各藩所设之藩校、乡校,无不开设汉学课程并学习儒家经典,且有的乡校专门面向庶民。民间的汉学者也纷纷设塾讲学,甚或有相当多的学者辞官不做,尽心致力于儒学的传播与研究,从而赋予儒学在社会上道德教化以及化民成俗的功能。

其三,敢于批判,重在体会接受儒学的精义。在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学习与吸收中国儒学不仅没有深入涉及道德教化层面,而且多限于表层,至于去粗取精、勇于批判的现象则十分罕见。而在江户时代,对于儒学尤

① 武田祐吉校注《日本书纪》三,朝日新闻社,1954,第22页。

② 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第60页。

其是宋明理学的批判则屡见不鲜，似同常事。而在批判儒学的各学派中，尤以古学派为最。他们针对宋儒关于世界起源、理气分殊、天理与人欲等理学核心内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伊藤仁斋就指出：“盖天地一大匣也，阴阳匣中之气也，万物白醭蛀蝉也。是气也，无所从而生，亦无所从而来。有匣则有气，无匣则无气，故知天地之间，只是此一元气而已。可见，非有理而后生斯气。所谓理者，反是气中之条理而已。夫万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阴阳，而再求夫所以为阴阳之本焉，则不能不归之于理，此常识之所以必至于此，不能不生意见。……大凡宋儒所谓有理而后有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等说，皆臆度之见。而画蛇添足、头上安头，非实见所得者。”^①这种切中要害的批判，在日本是前无古人的。获生徂徕也说：“后世儒者不识先王之道，乃逞其私智，以谓为善而去恶，扩天理而遏人欲也；此见一立，世非唐虞，人非圣人，必恶多而善少，则杀气塞天地矣。故通鉴之于治国，性理之于修身，人与我皆不胜其苛刻焉。遂使世人谓儒者喜攻人，岂不悲哉！”^②这无疑是对朱熹所倡之天理人欲之说的彻底否定。

其四，形成自己的学问体系，更加注重实用性。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不同于以往的还在于，从学理而言，日本再也不是照本宣科式地进行，而是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学问体系，并非常注重儒学之于日本的适用性，或曰经世致用的功能性。自古以来，日本就有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传统。隋唐时期日本不仅向中国学习政治、经济制度，而且也学习儒学中的统治思想，并加以运用。如圣德太子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中就有大量的体现：“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三曰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四曰群卿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十二曰国司国造，勿敛百姓。国靡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为王臣”。^③然而，即便如是，此时对儒学的学习与吸收也还是停留在照抄照搬的水平上。江户时代则完全不同，由于大批汉学家的涌现，不仅各学派林立，而且每一学派均有自己的学问体系。而在

① 井上哲次郎、蟹江义丸编《日本伦理汇编》第5卷，临川书店，1970，第12页。

② 获生徂徕：《辩道》第11页，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第145~146页。

③ 武田祐吉校注《日本书纪》四，朝日新闻社，1954，第236~238页。

适用性方面，则较以前更为突出，尤其在江户时代中后期更是如此。如以《日本外史》而闻名的赖山阳，便有相当多的关于“实”与“适用”的论述：“我学有一宗旨曰‘实’，又折为两字曰‘适用’，为人要实，读书要实，作文章又要实，实则适用矣，其不适用者，不必为不必读不必作也，故又衍为三字曰‘通大义’。”^①又如他在《君子儒论》中的论述：“夫谈性命，辨天下，儒之君子者也，而徒谈性命，辨天下，而遗日用之务，亦无用之物耳。研训诂，究章句，儒之君子者也，而徒研训诂，究章句，而瞠其神明，亦卑猥之业耳。述五帝三王之道，经纶天下国家，儒之君子者也，而徒称述帝王之道，而不知通诸今日，徒知经纶天下国家，而不知正其身以正人，亦迂腐浮夸之谈耳。此皆未免儒而同小人也。”^②尽管作者在论述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区别，但文中所体现的无不是“实”与“适用”的问题。如果死读书本而与“日用”无关，又不“通诸今日”，便不是真正的儒之君子了。

一般说来，在日本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治维新，代表了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成功，抑或曰近代化的成功（当然，这种成功只是相对而言）。然而，这种成功如果没有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没有思想文化中的理论积淀，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不可想象的。而把明治维新的成功仅仅归因于日本的仁人志士决心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日本中下级武士决心改变自身困境的结果，也不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缺憾。或许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的成功，没有儒学的普及，没有对儒学的批判，没有实用思想的发扬，日本就不会有明治维新前推动社会变革的思想理论的产生。

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明治维新前日本吸收改造中国儒学的史实进行研究——这便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① 《山阳先生书后》第51页，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第360页。

② 《山阳文集》第2卷，第58页，转引自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第359~360页。

目 录

第一章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吸收中国儒学概况	1
第一节 古代汉籍东传与日本皇室贵族的运用	1
第二节 日本中世僧侣对儒学的传播	9
第二章 德川幕府的建立与其面临的文化选择	19
第一节 政权初立时的国内形势	19
第二节 德川幕府的对外关系	23
第三节 中国儒学对德川幕府的适应性	28
第三章 朱子学派之与中国儒学	33
第一节 藤原惺窝的朱子学	33
第二节 林罗山家学的朱子独尊	41
第三节 室鸠巢朱子学的特色	52
第四节 藤田东湖与《弘道馆记述义》	62
第四章 古学派之与中国儒学	74
第一节 山鹿素行的所谓古学	74
第二节 伊藤仁斋与古学派	85
第三节 伊藤东涯的子承父业	100
第四节 荻生徂徕与古文辞学派	119
第五章 阳明学派之与中国儒学	129
第一节 中江藤树与阳明学派	129

第二节 熊泽蕃山对阳明学的贡献	140
第三节 后期阳明学者大盐中斋	149
第六章 折衷学派之与中国儒学	163
第一节 井上金峨的实用折衷	164
第二节 大田锦城的谈经论道	173
第七章 独立学派之与中国儒学	181
第一节 三浦梅园及其“条理学”	181
第二节 帆足愚亭对儒学经典的理解	189
第三节 二宫尊德的“分、度、让”论	199
第八章 国学派之与中国儒学	209
第一节 荷田春满对契冲国学的继承	209
第二节 贺茂真渊对中国儒学的刻意曲解	215
第三节 本居宣长的神道构图	222
第四节 平田笃胤的学术——日本是神国	228
终章 结论与反思	237
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51

第一章

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吸收中国儒学概况

江户时代日本能够大规模吸收中国儒学，并加以利用与改造，这与古代中日之间的友好交往是紧密相关的。正是由于古代中日交往频繁，使博大精深的汉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才为日本江户时代吸收儒学做了充分的历史积淀。我们在研究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与改造问题时，如果不对古代中日交往进行回溯，必将无以透彻说明这一问题。但笔者在此所说的“文化”，并非广义上包罗万象的文化，而是仅指精神文化或曰汉籍，意即文本文化而言。由于日本古代并无文字，其后日本文字的生成与发展都是借用中国文字而来，因而中国文字与汉籍的输入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节 古代汉籍东传与日本皇室贵族的运用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交往历史悠久，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日中文化交流史》所载：“早在远古时代，日本同朝鲜之间，不但显然有了航路，往来相当频繁，而且中国的文化也远远经由这些航路传到了日本。”^①但是因时代久远，中国传至日本的文化内容，除考古研究所发现的铜剑、铜铤、铜钱等物品外，余者因缺少文字记载而不清晰。在中国古籍中，最早虽有《山海经》中有关“倭”的记述，但也只是寥寥十余汉字，而其中“倭”字是否指现在的日本，在学界尚有争议。为学界主流所承认中日交往的确切文字记载是《汉书地理志》中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

^①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页。

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在《后汉书》中又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的中日两国官方正式交往记录，且汉武帝所赐之印，于1784年在日本福岡博多湾志贺町出土。三国时代魏明帝诏封日本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赐以金印紫绶。“作为对卑弥呼贡品的答礼，赠送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纁粟罽十张，蓑绛五十匹。此外，又特赠紺地句文锦三匹，细斑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①在上述的各种记载中，均不见有中国古籍传至日本的记述。就其需求来说，日本此时尚无文字，因而对书籍的需求程度几无。虽然在魏使至日时，也有“为檄告之”之举，可以说说明当时日本曾有认识汉字、懂得汉语之人，“不过，正如和辻哲郎所说，这些文字还只是外交和贸易上的实用符号，而不是表现思想的工具”。^②根据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特性，在通常的状态下，物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必然先于精神文化方面。所以，在先秦时期中国的精神文化或许还没有传到日本。

古代汉籍东传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是一条途径。通说是公元285年，百济人王仁带去由汉郑玄作注的《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有中国学者认为：王仁在日本教授倭王太子菟道稚郎子学习中国经典，不仅有《论语》，而且包括《诗》《书》《易》《礼》《春秋》。这些经典传入日本的时间，已经难以考证清楚。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千字文》肯定不会和王仁所带的《论语》，同时进入日本。因为在传说中王仁献《论语》的应神时代，撰写《千字文》的梁朝周兴嗣尚未诞生。《千字文》传入日本，肯定比《论语》要晚。日本早期的史学家在创造王仁传说时，把二者共同附会到王仁身上。^③但不论《千字文》是否与《论语》等儒学经典同时传入日本，亦不论《论语》等儒学经典究竟是在哪一年传入日本，从中日两国的古史资料中，都可证实汉籍东传日本的途径首先是通过朝鲜半岛而进入的，此为不容争辩的事实。

在两国使节的相互往来过程中，使汉籍东传有了另一途径。至隋唐时期，日本通过向中国派遣使节的官方往来，开始了向中国全面学习时期。

①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4页。

②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9页。

③ 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93页。

小野妹子作为日本第一任遣隋使于公元 600 年来隋，据中日双方的史料所载，此次还发生了所谓国书之争，但史料中并无日本使者带回汉籍的内容。不过，公元 604 年，小野妹子再次作为正使来隋，日本的史书《经籍后传记》中即有如下记述：“以小治田（指推古帝）朝十二年，岁次甲子正月朔，始有历日。是时国家书籍未多，爰遣小野臣因高于隋国，买求书籍，兼聘天子。”^①虽然中日两国史书均未记载此次日本使臣回国带回多少汉文书籍，但从小野妹子在隋长达一年之久和其来隋的主要目的来看，应该有汉籍被带回日本。唐朝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将汉籍带回日本的情况很多，“计有吉备真备带回《唐礼》一百三十卷、《太衍历经》一卷、《太衍历立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玄昉带回经论五千余卷”。^②

九州的大宰府是古代中日交往的重要窗口，据《续日本纪》所载：“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③《续日本纪》为菅野真道于公元 797 年编纂完成的日本史书，其中所记内容为从文武天皇元年（697）至桓武天皇延历十年（791）的 94 年日本历史，由此可知，中国的“五经”与各种史书此时都已经传到了日本。另据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年间，陆奥守兼上野权介藤原佐世奉敕所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载：“弘文馆集贤司经，崇文太帝皆藏书之所，然集贤所写皆御本也，定以甲乙丙丁，分为四部，有经史子集，四库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开元十九年，车驾发京时，集贤四库书物八万九十卷矣。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二卷矣，史库二万六千八百廿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七千九百六十卷。”^④此书目录又称《见在书目录》《外典书籍目录》，是因清和天皇贞观 17 年（865），日本皇室冷泉院大火，图书烧毁殆尽，根据重新搜集到的书籍而编成的书目。后在 1851 年，日本汉学家安井衡又据帝国图书

① 转引自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 1 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 99 页。

②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 188 页。

③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 190 页。

④ 续群书类丛完成会《续群书类丛》第 30 辑下，该会发行，1937，第 49 页。

馆本和古典保存会本校合而收录于《续群书类丛 杂部》之中。安井在“书《现在书目录》后”中言：“右目中所收，为部千五百七十九，为卷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分四十家，七纬不着卷数。”^① 观此书目录，不仅有经史子集各类，而且医学、诗歌、杂记等无所不包，由此可知当时日本所藏汉籍内容之广，数量之多了。从安井所言“然其亡于汉而存于我”的词语之间，也可推知：中国当时佚失之书，在日本或有所存。

两宋时期中日僧侣交往频繁，很多汉籍通过他们带到日本。据台湾学者郑樵生所引释大道一所作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所载，日本人宋僧圆尔辩圆于1232年回日本时带至京都东福寺的汉籍就有如下之多：《周易》2卷，《周易音义》1卷，《易总说》2册，《易集解》8册，《纂图互助周易》1册，《尚书》1册，《毛诗》2册，《礼记》3册，《春秋》5册，《周礼》2册，《孟子》2册，《吕氏诗集》5册，《论语精义》3册，《孟子精义》3册，无垢先生《中庸说》2册，晦庵集注《孟子》2册，《论语直解》1册，《直解道德经》3册，《毛诗句解》3册，《尚书正文》1册，《毛诗》3册，胡文定《春秋解》4册，《五先生语》2册，晦庵《大学》1册，《大公家经》1册，黄石公《素书》1册，小字《孝经》1卷，《百家姓》1卷，《九经直音》1册，晦庵《中庸或问》7册，晦庵《大学或问》3册，连相注《千字文》1册，《庄子疏》10卷，《六臣注文选》21册，《杨子》3册，《文中子》3册，《韩子》1册，《事物丛林》10册，《方輿胜览》9册，《汉摛》2册，《帝王年运》3册，《招运图》1册，《注坡词》2册，《东坡长短句》1册，《诗律捷径》2册，《笔书诀》1册，《诚斋先生四六》4册，《启札矜式》8册，《万金启宝》3册，《圣贤事实》2册，《帝王事实》2册，《三历会同》3册，京本《三历会同》1册，《连珠集》1册，《搜神秘览》3册，《宾客接谈》1册，《合璧诗学》2册，《四言杂字》2册，《小文字》4册，《说文》12册，《尔雅兼义》3册，大字《玉篇》5册，大字《广韵》5册，《玉篇》3册，《广韵》5册，《韵关》2册，《韵略》2册，《白氏六帖》8册，《历代职源》1部10册，《白氏文集》11册，《韩文》11册（不全），《柳文》9册（不全），《老子经》1部2册，《庄子》1部（缺自一至五），

^① 续群书类丛完成会《续群书类丛》第30辑下，该会发行，1937，第50页。

《太平御览》1部,《毛诗注疏》7册,《合璧诗》8册,《周礼》3册,《积玉》3册,《礼记》5册,《孟子》2册,《周易》2册,《注论语并孝经》1卷,《礼书》3册,《杨子》2册,《注蒙求》1册,《文中子》1册,《荀子》1册,《鲁论》2册,《轩书》3册,《大学》1册(书本),《注千字文》1册,《大明录》3册,《玉篇》、《广韵》各4卷,《语真寺诗》1卷(书本)。^①由书目种类观之,不仅是经史子集无所不包,从其版本而言,有的书籍已经不限于一种。

汉籍东传日本也并非一帆风顺,仅以上列书目中的《太平御览》为例:“李昉等奉敕撰成之太平御览,久为日鲜人士所钦慕,屡遣使索求而不得,宋孝宗时,始入于日本平清盛之手,清盛更献之于安德帝(见《山槐集》);是为太平御览传入于日本之始。其后权大纳言藤原师继以钱三十贯购得宋商之太平御览一部千卷,太平御览始得盛行输入于日本。”^②这里虽然没有确切记载平清盛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此书,但从其将此书献给天皇以及藤原师继不惜重金购买的事实来看,足见当时日本皇室与贵族们对中国书籍的重视和对中国文化的仰慕之情。

及至元明时期,汉籍东传之势有增无减。日本学者足利衍在研究金泽文库藏书时,曾将所有书目一一列出,郑樵生曾“举信为元明时代东传之汉籍书目”引列如下:宋槧本《春秋谷梁传集解》,《集韵》9册,《春秋公羊传正义》,宋槧本《尚书正义》17册,宋槧《论语注疏》5册,《荀子》,《小学》,《后汉书》,宋槧本《南史》零本1册,宋槧本《太平寰宇记》残本25册,宋槧本《南华真经注疏》2页,宋槧本《诸病源候论》,宋槧本《太平圣惠方》46册,宋槧本《杨氏家藏方》7册,宋槧本《初学记》7册,宋槧本《锦绣万花容》零本7册,宋槧本《锦绣万花容》卷目1卷,宋槧本《昌黎先生文集》,宋槧本《柳文》零本1册,宋槧本《王文公文集》18册,宋槧本《崔舍人玉堂类编附西垣类稿》8册,宋槧本《大藏经》全部,宋槧本《世说新语》,宋槧本《新编类要图注本草》,宋槧本《备急千金要方》,宋槧本《外台秘要方》残本11册,宋槧本《太平御览》114册,宋槧本《画一元龟》残本18册,宋槧本《宋景文集》残

① 郑樵生:《中日关系研究论集》(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第94~95页。

②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第125页。

本6册,宋槧本《东坡集》残本17册,宋槧本《六臣注文选》21册,宋槧本《大藏经》残本460帖,宋槧本《科注法华经》6册,宋槧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8帖,宋槧本《弘明集》,宋槧本《重编天台诸文类集》1册。^①在元明时期汉籍东传的过程中,仍然是日本僧侣们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佛教经典外,其他书籍也通过僧侣之手传到日本。入明僧策彦周良在其《初渡集》与《再渡集》中,记载了其个人自嘉靖十八年至嘉靖二十八年的10年间,由中国人赠予及本人购买的书籍,计有:《听雨纪谈》1册,《医林集》10册,《续杜愚得》8册,《鹤林玉露》4册,《白沙先生诗序》3册,《李白集》4册,《古文大全》2册,《九华山志》,《升庵诗稿》1册,《三场文选》3册,《文意规范》2册,《张文潜集》4册,《注道德经》1册,《文献通考》1部,《剪灯新余话》2册,《本草》10册,《奇效良方》1部。^②从上可以看出由于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纸质书籍得以大量出版发行,所谓宋槧本传入日本较多,亦可知汉籍东传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是紧密相关的。

自汉籍东传日本之始,日本皇室贵族便对其加以学习和利用。645年,日本实行大化改新,开始使用年号。而其“大化”这一年号,即来自中国古籍。按北京大学刘元满先生的说法,此年号的出处,一为《吕氏春秋》中的“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一为《汉书·隋吏传》中的“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③前者又名《吕览》,为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与其门客所撰,后者则为东汉历史学家班固之作。如果“大化”年号来自于此,可以说明此二书已经传入日本。但中国古籍中有“大化”二字者,还有很多。诸如:《周书·大诰》中的“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孟子·尽心》中的“夫是之谓大化”,《孟子·家语》中的“君能修此三者,则大化忤乎天下”等等。就是《汉书》也不止于《隋吏传》,在《董仲舒传》中也有“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的表述。另外,在其颁布的改新诏书和此前所制定的《宪法十七条》中所使用的词语,即有诸多汉籍内容。如“一曰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三曰承诏必谨,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天覆地

① 郑樵生:《中日关系研究论集》(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第104~106页。

② 郑樵生:《中日关系研究论集》(二),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2,第97~98页。

③ 刘元满:《日本皇名、年号用字中的汉字文化表现》,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载，四时顺行……四曰群卿百寮，以礼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礼，上不礼而下非齐，下无礼以必有罪，是以群臣，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① 这些内容无疑是中国已传至日本的汉籍中的儒家思想内容。

再如《日本书纪》中所载雄略天皇诏书：“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②《隋书·高祖纪》中有如下记述“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③ 这两段文字，除“朝野衣冠，未得鲜丽”是“四海百姓，衣食不丰”的改写之外，其余几乎是一字不差，而其所改的意思亦是稍有差异而已。按《隋书》始修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先是由魏征主修，后又由长孙无忌监修，最终完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而《日本书纪》成书于720年，后者无疑抄自于前者。其中所改的两句，依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的分析，是雄略天皇深受中国南朝的刺激，于是天皇可能也想要在日本实现汉人所说的“衣冠之邦”，但尽管他作了很大的努力，甚至包括“使后妃亲自养蚕”，最终还是“事未竟而死去”，所以才在遗诏中表示遗憾。^④ 这种说法显无历史根据，按中国史书《宋书夷蛮传》所载，在邪马台女王之后，进入赞、真、济、兴、武五王时代，而倭王武即雄略天皇。雄略天皇曾向中国南朝刘宋王朝请封。在当今学者蒋立峰的《日本天皇列传》中，称雄略天皇456年继承皇位，死于479年，终年62岁。^⑤ 而《隋书》为656年最终完成，雄略天皇即使真有其人，也不可能读到近200年以后的史书。不过，《日本书纪》中有与《隋书》相同的记述，并将其牵强附会到雄略天皇身上，却恰恰说明在《日本书纪》出现之前，日本的皇室贵族与史官们已经熟读中国史书了。

自从王仁传播《论语》等儒学入日之后，及至6世纪初儒学已被日本大量移入，在皇室贵族中研究儒家经典渐成风气。隋唐时期，日本在学制方面效仿中国，据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所载：“置大学于京都，

① 小林一郎：《历代诏敕抄》，平凡社，1942，第257～267页。

② 小林一郎：《历代诏敕抄》，平凡社，1942，第111页。

③ 魏征主修《隋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第52～53页。

④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8页。

⑤ 蒋立峰：《日本天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1，第29、31页。

隶属于式部省之下，教育五位以上之子弟。国有国学，隶属于国司，以教育各地人才。此均与唐代学制无甚差异。大学内设明经道及纪传道等课程，关于礼记、春秋、左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等之研究，乃属于前者；关于文选、尔雅、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之研究，乃属于后者，此等经史等汉籍，悉由我国传入者也。”^① 这些儒学经典及史书成为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的教材，为日本皇室贵族及其子弟们所学习。在礼制方面，嵯峨天皇于818年向全国下诏：“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但五位以上，礼服服色及仪仗之服，并依旧章。”^② 这也是学习中国礼仪文化的表现。

日本皇室与贵族们虽然热衷对儒学的学习，但其对儒士并不看重。宇多天皇时期，曾经得到宠信并被任命为右大臣的菅原道真，当宇多天皇让位于醍醐天皇之后，他就曾多次上表请辞，昌泰二年（899）2月27日，他在《辞右大臣第一表》中说：“臣，地非贵种，家是儒林，偏因太上皇往年拔擢之恩，自至诸公卿，今日升进之次，无寝无食，以思以虑，人心已不纵容，鬼瞰必加睚眦，伏愿陛下高廻圣鉴，早罢臣官，非唯不夺志于匹夫，亦复得从望于众庶。”^③ 同年3月4日他又上第二辞表称：“犹踞炉炭以待烧亡，履冶冰而期陷没矣。”再次要求“陛下追廻圣命，赐解臣官，改授其人。”^④ 在两次辞职未果之后，又在3月28日上第三辞表，要求“君叡览降，宸衷曲鉴，削臣官以全臣福，掙臣宠以保臣身。宠渥官崇，皆是不翅之飞翔也；身安福景，岂非无涯之需泽乎！”^⑤ 从其表文的行文风格与内容来看，可见菅原道真汉文造诣之深，文辞之精练，言辞之恳切，对儒学文本运用的熟练程度，决非逊于中国当时的儒者；而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菅原道真竟然三次上表请辞的情况来看，则可推知他当时所受的贵族压力之大。事实上，他确因受到操控朝廷大权的显贵藤原时平的诬陷而被贬职。

上述各种历史事实说明，尽管古代日本已经对中国儒学进行了吸收，

①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第86页。

②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98，第88页。

③ 柿村重松：《本朝文粹注释》第5卷，内外出版，1922，第661页。

④ 柿村重松：《本朝文粹注释》第5卷，内外出版，1922，第664、667页。

⑤ 柿村重松：《本朝文粹注释》第5卷，内外出版，1922，第670~671页。